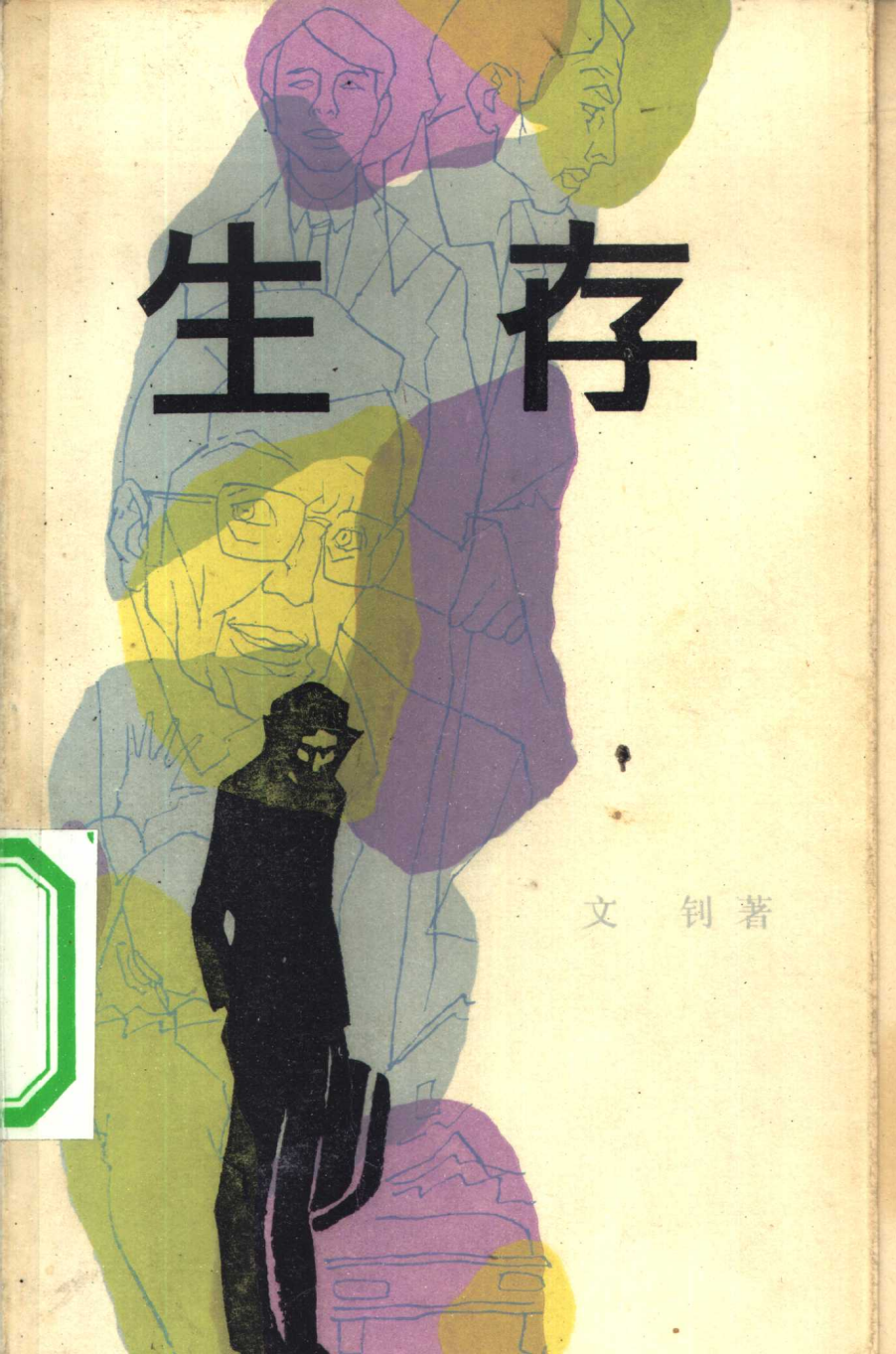


生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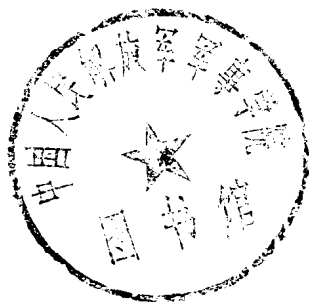
文 钊 著





生存

文 钊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马 云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插图：夏予冰
 龚 除

生 存

文 钊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6.75 插页 10 字数 94,000

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5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235 定价：0.66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描绘异国风情的中篇小说。主人公陈增平是个中年医生，十年动乱时期中因海外关系，受到迫害。七九年黯然抛妻别子，远渡重洋，去到加拿大投奔胞兄陈开平。陈增平原想在加开业行医，由于英语也讲不流畅，连研究生都当不上。又想做保险公司的掮客，房屋出租公司推销员，均不成功。一次偶然遇到老同学孙竟全在加一年，找不到工作，竟沦落在百货商场扫垃圾，当清洁工，住在几平方米的破屋里，对他思想触动很大；加上其兄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，其侄陈志强和他女友白人姑娘琼都愿意去中国学习，他感到叛离祖国，到国外谋生是极其错误的，才幡然憬悟，返回祖国，决心投身于“四化”建设。

作品对加拿大湖光山色的描绘，西方社会生活的反映，都很富有异国风采。

我写这篇小说的一点想法

代 序

蛰居海外二十多年，对于祖国多方面的情况，可以说茫无所知。对祖国的一切，除了内心关切之外，我无能为力，甚至怎样为祖国尽一点微薄的力量，也摸不着头脑。对中国我是陌生的，仿佛中国只是遥远的，天边外的莫测高深的社会。

一九七九年，我到上海工作了一年。我惊奇地发现，原来中国和外界的隔膜程度，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。前一阵，我曾两度来到祖国旅行，我虽想探索一番，摸一点情况，但始终看不出个究竟来。一直到这次居留了一年，才深切地感到，文化大革命，把一个原有丰富

历史的文明大国，带入到了愚昧无知的深渊。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。”中国有句古话：“一粒老鼠屎，弄污一锅汤。”没想到，几粒政治上的“老鼠屎”，把全中国人民，毒害到如此程度。我经常为此而叹息，为可爱可敬的祖国人民鸣不平。

由于这种毒害，使得中国与外界的情况完全隔绝，从而使许多人对外界的一些虚假的繁荣，表面的物质享受一味去作盲目的追求。我身为华裔，我认为，应该把外界的情况，通过文学让读者有个较为清晰的了解。不过单靠一本小说，而且是不成熟的小说，对于想追求虚荣和物质享受的人，是起不了太大作用的，有些读者可能会怀疑，认为这样的小说，不过是说教罢了。不论读者对这本小说的看法如何，我以献身于文学的决心，真诚地说，在这本小说中，没有夸张，也不存在虚构。

多少人经历了这一场浩劫之后，有亲人在海外的，都期待着能够重新团聚，也希冀得到一臂之助。要知道，文化大革命虽然把中国社会搞得黑白不分，是非颠倒，但中国传统中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关系，并没有完全被破坏，特别是家

属之间的互相关切，互相爱护，仍然到处可寻。假如以同样的心情，到外国社会中去寻求，不能说没有，恐怕会让人感到失望。这决不是说国外的亲友失去了理性，泯灭了良心，让人感到冷酷无情。事实上，不同的社会环境，不同的生活习惯，彼此之间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看法。

书中的男主人公陈开平，对待从国内来的亲兄弟陈增平，并不是冷淡无情，只不过他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磨练以后，对人生用另一种充满矛盾的心情来看待罢了。关于陈增平，他只是对自己的祖国一时感到失望，在国外亲身尝到了谋生难的苦味之后，终于觉悟过来，最后仍将希望寄托在中国这一个大家庭中。

孙竟全也只是千百个从中国移民到国外的一个例子而已，这种例子，在外国社会里，真是随处可见。孙竟全有过错吗？他自己是不是愿意这样做呢？这些问题，都需要读者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去找寻答案。

陈开平的儿子是典型华裔的后代，父子之间的矛盾和隔膜怎么解决，也是个现实问题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，但每一个“我”如何看待社会、国家，这是个重要

的课题，尤其对中国，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抛弃自己的国家，让国家一直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，而去追求个人表面的生活享受，还是要全国团结起来，改变中国的面貌？这个问题，不能单单要求人民来解答，应该由每一个中国人，不论身份、不论职位，共同来解答才对，单要求人民来解答是不公平的。

我写这本小说，把文学作为武器，对中国充满了热爱，对中国的前途满怀信心，才敢把国外的真实情况表达出来，奉献给广大读者，也许不无裨益吧。当中国迈向公元二千年现代化的康庄大道时，需要的是人民之间的团结，绝对不是对国家的背弃。需要的是每一个中国人之间互相谅解，而不是无情的斗争。

苦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海内外的黄帝子孙，应该携手共同奋斗，国家需要统一、团结、友爱和壮大。这是我写这篇小说的一点希望，我相信，这个希望，在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下一定会实现。

一九八〇年九月九日夜写于加拿大寓所

初冬的温哥华，寒气逼人。在天亮前的那一刻，四周静悄悄的，路灯光下，只见雾茫茫的一片，更使人感到冷气袭人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雪了，一夜之间，整个城市已经披上了冬天的雪袍。

晨光熹微，象细絮般的雪花，仍在随风飘舞。有时在半空中打了几个转，无目标地飘飘荡荡，犹如轻盈的白蝴蝶似的，最后飘落在电线上，树枝上，屋檐上，把这清晨前的城市，打扮得分外秀丽。

街道上，或是通往郊区的高速公路上，除了路旁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之外，中间的路面，早被赶早的大卡车，压出了一条泥泞的曲线，象条巨

蛇，被碾得支离破碎，躺在那里，流淌着漆黑的泥水。

仍然是那批赶早的卡车，发出低沉的宛似老人呻吟的引擎声，划破了这清晨的宁静。卡车过后，四周又归于沉寂，留下那路旁的街灯，似受了惊悸一般，在寒冷的空气中喘着气。

在这寂静的寒冷的早晨，唯一使人觉得温暖的，是离公路不远处，那家日夜服务的小咖啡馆。旁边的停车场上，停着几辆小车和大卡车。停车场上的积雪，也早让那些赶早的车辆，碾得泥糊一片了。

从咖啡馆的玻璃窗上望进去，里面的灯光有些昏暗，只见有些人影在晃动。因为室内的温度和室外不一样，看上去烟雾腾腾，分不出空气里的水蒸气多呢，还是有太多的人在抽烟。

在咖啡馆里，坐着几个工人模样的客人，眼睛里布满血丝，显然是熬夜过度了；或是开了长途车，特别在下雪的夜晚，开车更伤眼力。这些工人，有些在大口地吃着炒鸡蛋，也有的两手捧着热咖啡杯在取暖，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是木然的，加上那额前和眼角早衰的皱纹，显示出生活是多么艰辛啊。

值班的是个中国血统的青年人，二十来岁，戴了副细金边眼镜，模样儿文绉绉的，看上去精神挺不错，可眼睛红丝丝的，显然他也熬了夜。

“喂，陈，再来一杯咖啡。”一个工人模样的客人喊道，看来他是这座小咖啡馆的常客，对这年轻侍役是相当熟悉的。

“这儿是你的咖啡，彼得。”那小伙子一面熟练地提了玻璃咖啡壶，为这工人又斟满了咖啡，一面说：“工作怎么样？”

“唉，外面有谣传，下个月要解雇一批人。不知道会不会轮到我头上。”叫彼得的工人，摇了摇头，端起咖啡来喝了一口，又问那年轻人：

“你什么时候毕业？”

“还差一年半，今年暑假，还要找份工作，赚了钱，才能付最后一年学费，要不然，伸手向父母要，总是一种羞耻。”

“这儿的小费怎么样？”彼得关心地问道。

“还过得去。只是夜里的工作不好受，第二天又得去上课。可工作不好找，又有什么办法？只好硬撑下去。”

“你们中国人真好，勤俭节约，家庭关系也不错。”

“也不是每个家庭都这样。我很幸运，我的父母对我很照顾。”陈一面把客人喝过的咖啡杯、盘子刀叉等等，放进大盆里，一面擦着柜台，边笑边说。

“如果我的父母，能供我读书，那我也不会象今天这样，整天跟卡车打交道，而且经常还要担心失业。”彼得捧着咖啡杯，那高矗的鼻子，几乎塞进杯子里去。

“不过，三年前，我进大学之前，就开始自己工作，不再依靠父母了。”

闲聊几句以后，陈又不便再多说什么，类似这样的谈话，他已听了不知多少遍，在随时都有失业威胁的社会里，象彼得这样的心情，他是完全可以体会的。因此他沉默了一会，用职业上常用的一句话问道：

“还要别的东西吗？”

“不要了，谢谢，账单。”

陈回转身来，在计账机上，熟练地打好账单，反过来放在暗红的小塑胶盘子里，递给彼得。

彼得把账单翻过来看了看数目，从皮夹里取出一张五元的纸币，放在账单上，朝陈那面

一推：

“不要找了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陈又回到计账机前，按了下钮，机器下面的那个钱柜立刻弹了出来，他将五元纸币放了进去，取出了零找，丢进旁边那只放小费的罐子里。

“下礼拜再见。”彼得戴上了呢帽和手套，又披上外套，他打开大门，从户外透进来的冷气，使他打了个寒噤。他随手把衣领翻了过来，又将胸口一直到脖子下的扣子都扣得紧紧的，爬进了那巨人似的卡车司机座，发动引擎，缓慢地在灰暗的晨光中渐渐远去。

这边，在咖啡馆里，陈仍然忙碌着，不时还从口袋里拿出手帕来擦擦额头上的汗。继续为客人送咖啡，端早点，打账单，又将用过的杯盘刀叉收拾干净。在这不停的奔忙之间，他也会偶然看看腕表，禁不住用手掩着嘴，轻轻地打个呵欠。

二

在温哥华市区，离那日夜服务的咖啡馆不远的地方，有一排私人住宅。这批住宅并不是高级住房，一来房子比较古老，再则这个地区，经常有卡车来往，而且花园又不怎么精雅。在这个社会里，一个人的身份，是要靠新式小汽车，修剪得典雅的花园，以及宽敞的住宅来评定的。卡车经过得多的地区，那是不能列入“高级社会”的。

在这降雪的天气，白雪暂时把这条街上的凌乱现象掩盖了一下，此刻一切都在熟睡中。除了一二户人家从窗帘中透出一丝灯光之外，这时只能看到屋子上，树木上，停在马路两旁的车顶上，都被白雪覆盖着，一片银白世界。

陈开平一家，就住在这条街上。这时除了他儿子陈志强在那家咖啡馆值晚班以外，他们都在熟睡中。

六点整，他们放在床头柜上的收音机闹钟，自动地播送出唤人的音乐。对于陈开平夫妇来说，这种公式化的生活，特别是在都市，必须遵守。似乎在都市中，人与人之间，人与物之间，都必须按这种规律生活，要是不遵守的话，整个社会就会发生混乱。就因为每个人都有这种看法，日子一久，这种有规律的生活，慢慢地就变成了僵硬的机械化形式了。人也就变成这个机械生活中的一个零件了。

但在这机械式的生活中，有时候零件也会发生故障，或是产生阻力。

六时起床，已经成了陈开平夫妇的习惯。但在这寒冷的清晨，他也会懒洋洋地从那暖和的毛毯里，伸出手来，把收音机上的闹钟开关一按，又把手飞快地缩回到毛毯里，再翻个身，把头又往毛毯里钻。

可是不到五分钟，他的太太何淑英，先用肘拐触了他一下，随后又在他背上推推说：

“起来了！别又迟到。”

他“嗯”了一声，身子也动了一下，但又不见动静。何淑英没法，只得在他脚板心上搔了几下痒。这一来他只好坐起来，顺手摸到床头开关，打开床头灯。他先伸展了双臂，作个松一松筋骨的动作，然后又搔了几下头。滑下床来，用脚在地板上勾到了拖鞋，从床边的椅背上，将晨袍披上，一边嘴里叽叽咕咕说：

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就这样机器转动一样地在过日子。这架机器早晚也会有停的一天。”

“快去刮胡子吧。迟到扣薪水划不来。”何淑英这种话，在他们夫妇生活中，已说过不知多少遍了。

“扣薪水，扣薪水！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为了这两个臭钱。”他说完，把洗手间的门重重关上。

“唉！”何淑英只好摇摇头，先到小女儿陈翠环的屋子里，叫醒了她，立即赶到厨房去一面准备早点，一面又忙着包三明治，准备咖啡。最后又一份份地为丈夫、女儿安排好带去工厂和学校的中饭盒。

等到陈开平从洗手间出来，换好衣服，早点已经放在厨房的餐桌上了。何淑英的习惯是，

泡好一杯茶，坐在那儿看丈夫和女儿吃早餐。他们吃得多吃得多，她会很高兴。这天早晨，因为外面下了雪，她喝了口热茶，对丈夫说：

“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的雪，我去外面铲一下，要不然车子会开不出去呢。”

“我去吧。”陈开平放下了咖啡杯，用纸巾抹了下嘴，站了起来，但又半似牢骚半似诅咒地自言自语说：“铲雪，割草，油漆……一辈子都做不完，就成了现代奴隶似的。”

何淑英看了丈夫一眼，摇了下头，拿起日历本来，看看今天的记事：“呵！二弟今天下午到。”她提醒陈开平，谁去机场接呢。

事实上，陈开平并没有忘记这件事。他披着厚外套，在车库前一铲一铲地把雪推到车道的两侧，脑子里却一直在考虑二弟到加拿大来的事。

二弟来加拿大，先后酝酿了近一年。填表格，找谈话，从加拿大政府审查到批准，一关又一关，加上二弟在国内申请护照出境手续繁多，能来一次的确不容易。何况兄弟二人，已经三十年没见了。他怎么会忘记呢！

脑子里的回忆，象闪电一样，一下子追溯到